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022 0102 7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64年·北京

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

中国人民大学經济系国民經济史教研室編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藏書西人右邊胡同28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71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內 部 交 流

*

書号: 甲1555 开本: 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張: 14¹/₁₆

字数: 373,000 册数: 5,001—8,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4年2月第3次印刷

統一書号: K4011·361

定价(4): 1.45元

目 录

序 言	1—8
-----	-----

第一編 外国資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 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 (一八四〇至一八九四年)

第一章 鴉片战争前清帝国的封建經濟和中外經濟关系	9—55
第一节 清帝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剝削	9
第二节 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和商品經濟的发展	19
第三节 資本主义的萌芽	26
第四节 清政府的对外經濟政策和中外經濟关系	36
第二章 鴉片战争和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	56—80
第一节 兩次鴉片战争对中国独立主权的破坏	56
第二节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得的經濟特权与外国 資本主义經濟势力的侵入	67
第三章 中国封建社会危机的发展与太平天国 农民革命运动	81—92
第一节 封建社会危机的发展	81
第二节 太平天国革命及其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	83
第三节 太平天国占領区內的經濟情况	88
第四章 外国資本主义侵入后中国自然經濟的初步分解 与中国資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93—139
第一节 中国自然經濟的分解	93
第二节 中国資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	113

第二編 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形成

(一八九四至一九二七年)

第五章 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扩张和对中国经济

命脉的控制……………141—163

第一节 帝国主义进一步掠夺经济特权与分割中国的斗争……………141

第二节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及其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149

第六章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64—214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164

第二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空前发展与战后的萧条……………185

第三节 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中中国银行业的兴起与发展……………204

第七章 中国农村经济的变化……………215—241

第一节 中国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215

第二节 中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殖民地性……………221

第三节 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对农村的搜刮与农村经济
的破坏……………234

第八章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242—257

第一节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4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249

第三編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崩溃

与新民主主义經濟的发生、发展

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

第九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

中国民族工业和农村經濟的破产或半破产……………259—307

第一节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世界资本主义經濟危机与
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259

第二节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的形成……………281

第三节	民族工业的破产或半破产	294
第四节	农村经济的破产	300
第十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出现	308—330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革命的开展	308
第二节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312
第三节	苏区工商业的发展和财政金融的状况	319
第十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的武装侵略与 敌伪统治区国民经济的殖民地化	331—366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占领区的掠夺	333
第二节	日本帝国主义对关内占领区的掠夺	343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区国民经济的崩溃	367—412
第一节	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失败	367
第二节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加速膨胀及其垄断的空前 加强	375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国民经济的破产	385
第四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崩溃	400
第十三章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全国 范围内的胜利	413—436
第一节	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	413
第二节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与农业生产的发展	418
第三节	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与财政金融状况	424
结 束 语		437—443

序 言

国民經济史是一門关于一国(或各国)經济发展規律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經济关系的发展,它要求按照历史年代順序,通过具体的史实,闡明一个国家(或各国)經济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規律性。

經济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它是人們生产的社会方面,即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之間的关系。它的性质取决于:生产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費四个統一的一面。

生产关系也就是一个社会的經济基础。它是一种社会制度不同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最根本之点,也是划分一个社会本身发展阶段的标志。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社会的經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①又說:“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資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謂社会关系,构成所謂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資产階級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

①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見《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2頁。

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

国民經济史就是以—个国家(或各个国家)这样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它从历史上考察—个国家(或各个国家)这样的生产关系的发展，闡明这个国家(或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关系演变的規律性。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經济史所考察的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統一社会生产整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必然发生相适应的变化。当然，生产关系也会反过来积极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国民經济史是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中，考察—个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規律性。

有人认为生产力也应该列入国民經济史的对象之中，认为国民經济史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科学。我們觉得这样提还值得研究。固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統一社会生产整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但是它們之間毕竟是有区别的。它們反映着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們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这两种关系表明世界現象中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现象領域。国民經济史所考察的对象只是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个現象領域。这一点正像生物学一样。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生物本身生长发展的規律，至于生物生长的条件(如空气、阳光、食物、水份等)虽然对生物的生长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这些条件却不能包括到生物学的对象中去。

当然，生产力不列入国民經济史的对象之中，不等于說国民經济史考察生产关系时，可以不注意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像生物学是把生物的生长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但在研究时仍須密切注意生物的生长条件一样，国民經济史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明生产关系发展的規律性。

① 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87頁。

此外，國民經濟史所研究的生产关系，是当作一个国家的經濟基础进行考察的。經濟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密切相关的，每一社会的經濟基础都产生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經出現，就反过来积极影响基础，加速或延緩基础的发展。因此，國民經濟史也是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考察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經濟基础的生产关系演变的規律性。

由上所述可知，國民經濟史是关于一国生产关系（即經濟关系、經濟基础）发展的科学。它从历史上揭明一个国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关系演变的規律性。

國民經濟史揭明經濟发展的規律，与政治經濟学不尽相同。政治經濟学所闡明的是人类社会經濟发展的一般規律，它并不表明某一个国家經濟发展的具体过程和規律性。比如它所闡明的商品生产的价值規律、資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規律等就是这样。只要有商品生产条件和資本主义生产条件存在的地方，这种規律就起作用。國民經濟史則不同，它考察的是一个国家經濟发展的具体过程和規律性。每个国家在自己經濟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具有許多特点。比如，政治經濟学闡明各种基本生产关系类型（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社会主义）更替的規律性，但在个别国家并不一定按照这样的順序发展。如俄国的各主要民族就沒有經歷过奴隶制阶段，而由原始公社直接跃进到封建社会。中国在自己經濟的发展中，也沒有經歷过典型的資本主义社会，它由封建社会經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正因为政治經濟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經濟发展一般規律的科学，所以它是通过“經濟范疇”来闡述的。所謂“經濟范疇”就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在理論上的表現。經濟范疇的推移，反映出社会經濟发展的过程，反映出社会經濟发展由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过渡。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論述的“商品”、“貨幣”、“資本”等，都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他的有名的公式——簡單商品流通公式： $T(\text{商品})—M(\text{貨幣})—T(\text{商品})$ ，是表明封建社会中的小商品生

产关系；資本的流通公式： $G(貨幣) \cdots T(商品) \cdots G(貨幣)$ ，是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由簡單商品流通公式過渡到資本流通公式，就是反映了資本主義在封建關係解體過程中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政治經濟學就是通過經濟範疇的推移來揭示經濟發展一般規律性的。當然，這種經濟範疇的邏輯上的進程與實際歷史發展的進程是一致的。

然而，國民經濟史則不同。國民經濟史是關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具體過程和規律的科學，因此，它必須從史實（史料）中，按照經濟事件發生的歷史年代順序，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整理出經濟發展、演變的全部過程，通過這種過程本身來闡明規律性。比如中國國民經濟史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規律，就必須從史實中整理出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全部具體的歷史過程，說明中國資本主義關係在什麼條件下出現，何時出現，如何出現，如何發展，在發展中又具有那些特點等。通過這種具體發展過程的描述，就揭示出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具體規律。當然，經過這樣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可能與政治經濟學所闡明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不一定完全相符。但這沒有關係；相反的，經過這種研​​究所得出來的結論，正是科學地表明了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具體道路。比如中國資本主義機器工業，就主要不是在原有的工場手工業的基礎上發生，而是在封建經濟初步解體過程中，還沒有出現大量的工場手工業的情況下，由於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出現的。

國民經濟史雖然與政治經濟學不同，但兩者的關係仍然十分密切。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經濟規律，是以典型國家的經濟史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如果脫離了對各國經濟史的研​​究，則必然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明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就是以英國經濟史為基礎。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終生研​​究英國經濟史及經濟狀況的結果”。^① 恩格斯對前資

^① 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編者（恩格斯）序，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30頁。

本主义各社会形态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就是以易洛魁、希腊、罗马经济发展史为基础而提供出来的。

政治经济学对国民经济史也是十分重要的。国民经济史是从史实中引出一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每一个国家，其经济发展中所表现出的面貌都是错综复杂的。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历史悠久的大国，历史史料更是浩若烟海，庞然杂陈，要从中探求出规律性，就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史料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综合。所以，国民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二者互为依据，互相补充。

下面谈谈国民经济史和通史的关系。

通史分为一般通史和国别通史。国别通史是研究一个国家在其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现象各方面的总和。它不但考察经济，而且考察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社会思想、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规律。其范围极为广泛。国民经济史则只是从历史上考察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范围较为狭窄。不过两者的关系也很密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就是因为它不再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是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一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正是国民经济史考察的对象。所以，国民经济史为通史在研究上提供了依据。通史对国民经济史的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国民经济史所研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发展并非全然无关。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等等各个领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国民经济史在考察经济发展时不能不考虑到其他社会方面对经济的影响。通史既然是阐明社会现象各方面发展的总和，所以它就为国民经济史提供了社会发展全貌的历史知识，作为研究时的参考。

此外，国民经济史既然要从具体史实出发，所以首先接触到的便是史料。史料是由史科学来研究和提供的，特别是考察远古社会经济

狀況時，往往由於史料缺乏，還必須求助於考古學、人類學、文字學等。而這些學科都是歷史科學的重要部門。這些學科對史料的廣泛發現、考證、整理，則為國民經濟史的研究打下可靠的基礎。可見，國民經濟史與歷史學也是密切相關的。

上面我們分析了國民經濟史研究的對象，下面我們談一談中國經濟史的問題。

中國經濟史要研究的是中國社會經濟關係演變的歷史過程和規律性。它分為三大部分，即中國古代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中國現代經濟史。中國古代經濟史一般是指中國的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和封建制經濟史而言的。具體的歷史年代是，從遠古起到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止。^① 中國近代經濟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演變的歷史。具體的歷史年代是，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中國現代經濟史則是指中國社會主義階段經濟發展的歷史，是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到現在為止。

在歷史上，所謂“近代”，通常是指人類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而言。在中國，沒有經過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所以，中國的“近代”，就是指從鴉片戰爭起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中國近代經濟史，就是這一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產生、發展和崩潰

① 這種分法嚴格說是不科學的。因為所謂“古代”，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指人類社會的奴隸制而言（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及《僱傭勞動與資本》中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敘述）。封建制度不包括在“古代”之中。“中世紀”才是指封建制說的。現在我們把中國古代經濟史包括了三種經濟制度，即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和封建制，顯然不合適。不過，現在學術界一般都這樣說，我們這里也姑且用一下，以後恐怕應該按照經濟制度來劃分。

的历史。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經濟史应止于一九一九年或止于一九二七年。主張前者的理由是：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出現的，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与领导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主張一九二七年是中国近代經濟史的終点的理由是：一九二七年在革命根据地出現了新民主主义經濟成分，中国社会經濟結構发生了变化，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崩潰的开始。因此中国近代經濟史应截止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年以后則應該是中国現代經濟史的范围。

我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討論的。究竟中国近代經濟史到什么時候为止，这个問題是取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究竟到什么時候結束，而什么时候又开始进入另一个新的社会經濟发展阶段。如果从这个原則出发来考虑，那末，我們觉得中国近代經濟史只能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因为：虽然一九一九年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二七年在革命根据地中更出現了新民主主义經濟，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从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整个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說，在这一段时期中，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的性质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标志着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終結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开始。所以，把中国近代經濟史截止于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七年，應該說都是不妥当的。中国的近代，只能是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中国近代經濟史也只能是从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发展的历史。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在其发展演变中曾經经历了三个

大的阶段,这就是:

一、一八四〇至一八九四年。这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經濟在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下,开始轉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阶段。

二、一八九四至一九二七年。这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完全形成和不断加深的时期。

三、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崩潰和新民主主义經濟产生、发展、壯大以及在全国範圍內取得胜利的时期。

我們就是根据这三个大的阶段,把中国近代經濟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八四〇至一八九四年;一八九四至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在讲义的内容上,我們把这三个时期作为三編来叙述。

第一編 外国資本主义的入侵，中国 社会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

(一八四〇至一八九四年)

第一章 鴉片战争前清帝国的 封建經濟和中外經濟关系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开始的。鴉片战争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鴉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是在鴉片战争后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下一步一步变成的，因此，研究这一段經濟发展的历史，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鴉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經濟的状况。

第一节 清帝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剝削

鴉片战争前，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之下。在这个社会里，社会生产的主要生产資料——土地，是掌握在地主、貴族和皇室的手里，而农民則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清初，清朝統治者入关以后，就頒布了所谓“圈地令”，通过强力手段圈占了大量土地。据估計，仅在今河北省境內(直隶)即占去了共約十六万七千頃土地^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620頁。

② 計內务府粮庄九十六万五千零四十九亩，納銀庄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九亩，宗室庄田一百三十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五亩，八旗官兵旗地一千四百零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亩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亩 見李文治編：《中国近代农业史資料》，第一輯，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21—23頁諸表。

滿族統治者們，把所圈占的土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①，也就是盡行分配給他們的皇室、貴族和八旗兵丁占有。這種土地稱為旗地。皇室、貴族們占有了土地之後，就在土地上組織了各種“莊田”，如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及八旗莊田等，並建立“莊頭”制度來對廣大農民進行封建剝削和壓榨。

除上述“莊田”之外，滿族統治者還擁有不少的屯田（約有四十八萬七千餘頃^②）。屯田有軍屯和民屯之分。軍隊的屯田，土地乃由各地駐軍耕種，收穫物充作軍餉。民屯則是屯田由農民佃耕，官府征收租銀。屯田中還有一種“漕運屯田”，是清政府撥給領運漕糧的軍隊的一種屯田。領有這種土地的軍隊，有的自己並不耕種，他們“或官召民佃，征租贍軍；或民賃軍田，軍自取息”^③。所以，這種屯田實際上也是一種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的形式。

清代皇室、貴族、八旗兵丁所佔有的各種莊田以及屯田等，都稱為“官田”。除“官田”之外，就是所謂“民田”。“民田”中絕大部分是歸地主所有的。農民只佔有其中極少的一部分。清代土地兼併很厲害，地主階級通過墾荒、接受投獻（農民迫於賦役繁重，把土地獻給地主，“自居佃戶”）、依勢侵奪、購買等方式，對土地大肆兼併。到清康熙年間（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土地佔有情況已經非常集中。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年）上諭中曾說道：“山東、河南田畝多令佃戶耕種。”其實不只山東、河南，全國情形都是這樣。到乾隆年間（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土地集中更加嚴重。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撫楊錫綬說過：“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旧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④

土地集中的結果，出現了許多大地主。如乾隆年間，直隸懷柔縣郝氏，有“膏腴萬頃”^⑤，當時（乾隆十八年）全國的耕地面積是七百零八萬多頃，而郝氏一家就佔了萬頃，幾乎等於全國土地的七百分之一。乾隆、嘉慶之際，權臣和珅占地八千餘頃，他的兩個家人也各有六

①—⑤ 見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第18、32、30、105、69頁。

百余頃^①。道光年間(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大官僚琦善占有土地达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②比和珅占有的土地还多兩倍以上。至于一般官僚,几乎也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

中国地主阶级集中了大量土地,一般都不直接进行经营,而是把土地零散的租给农民耕种,向他们收取封建地租。清代,满、汉地主也是这样,他们把集中起来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并向他们榨取地租。清代封建地租的形式,主要是实物地租。在一些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虽然也有用货币缴租的,但是其中多半是实物折租,并非真正的货币地租。真正意义的货币地租是很少的。

清代的地租剥削十分苛重。地租率一般是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嘉庆朝(一七九六至一八二〇年)各省实物地租租率和件数统计,在三十四个案件中,租率不满百分之五十的占十一件,租率为百分之五十的十九件,租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四件。租率为百分之五十和租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以上。^③此外,关于地租率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少记载。如清朝初年,直隶沧州地方,“耕土亩产,率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④。乾隆年间,南昌一带地租“上则亩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则亩率一石”^⑤(当时每亩产量上田约三石,下田一、二石)。嘉庆年间,一般地租额常是占收获物的一半,即所谓“各半分租”,“按半分收”^⑥。可见,地租率大体上是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以上。

以上只是农民必须向地主缴纳的正租。此外,许多地区,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各种附加租、预租和押租等。如浙江桐乡县,地主已经坐享佃户收获物之半,然而,“……每存不足之意,任僕者額外誅求,脚米、解面之类,必欲取盈”。^⑦江苏崇明“佃户墾田,先以鷄鴨送业主,此通例也。”^⑧江西萍乡县,租“田四十六亩并庄屋、园塘耕管,每年还稻谷四十七石。……押租钱八十八千文。”^⑨浙江、永嘉县,“……田五分,当付押佃钱一千六百文”^⑩。

①② 同上,第69页。

③—⑩ 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3、71、72、73、76、77、75、76页。